

邓晓芒 著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现代西方哲学并未与“古典”哲学相脱离

恰好相反，

它的存在使古典哲学的精华得以展现自身的全部潜能



三联讲坛

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This series covers a great array of college courses and speeches, selected for their intellectual distinction and scholarly excellence. The lectures were transcribed from classroom recordings and retain their stylistic character as they were originally delivered. Our hope is to open the college classroom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d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ety. The point is not only for the common reader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utting-edge ideas on campuses, but also for the academia's search for knowledge to become more meaningful by engaging people from the "real world".

邓晓芒 著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 邓晓芒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4

(三联讲坛)

ISBN 978-7-108-06246-8

I. ① 哲… II. ① 邓… III. ① 哲学史—方法论 IV. ①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0984 号

责任编辑 吴思博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校对 龚黔兰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3.5

字 数 463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6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三联讲坛

This series covers a great array of college courses and speeches, selected for their intellectual distinction and scholarly excellence. The lectures were transcribed from classroom recordings and retain their stylistic character as they were originally delivered. Our hope is to open the college classroom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d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ety. The point is not only for the common reader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utting-edge ideas on campuses, but also for the academia's search for knowledge to become more meaningful by engaging people from the "real world".

缘 起

对于孟子而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乐事之一;对于学子来说,游学于高等学府,亲炙名师教泽,亦是人生善缘。惜乎时下言普及高等教育尚属奢望,大学一时还难望拆除围墙,向社会开放课堂。有鉴于此,我社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辑为“三联讲坛”文库,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阅读,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一学校有一学校之学风,一学者有一学者之个性。“三联讲坛”深望兼容不同风格之学人,并取人文社科诸专业领域,吸纳自成一家的言之成果,希望以此开放格局与多元取向,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致力于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

作为一种著述体例,“三联讲坛”文库不同于书斋专著: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作者如有增删修订之补笔或审阅校样时之观点变易、材料补充,则置于专辟的边栏留白处,权作批注;编者以为尤当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抽提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凡此用意良苦处,尚望读者幸察焉。

“三联讲坛”文库将陆续刊行,祈望学界与读者并力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二〇〇二年五月

第三版序言

本书初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08年，2014年又出了一个修订版，其实并没有对内容作什么修订，只是排版上作了些改进，最后加了一篇对批评文章的回应。现在这个版本应该算第三版了，由三联书店惠允出版。这次我从头至尾进行了一番逐字逐句的认真校订，改正了不少错误和欠妥的地方，补足了第十三讲后面未完成的部分，使这个版本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改观。

本书虽然属于讲演录性质，不像正规的学术著作那样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但我以为，其学术性绝不应因此而有所降低，相反，书中许多方法论的问题国内尽管讨论得也不少，但像本书这样将方法论用于研究哲学史和哲学中的具体个案的却并不多。明眼人大概可以看出，我的哲学思想的底色还是基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传统，但我已将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胡塞尔现象学所带来的新思路进行了融合，并由此使这一传统具备了更为锐利的思想锋芒。我致力于证明，现代西方哲学其实并没有和“古典”哲学相脱离，恰好相反，它使得古典哲学中的那些精华部分得以展现出自身的全部生命潜能。

有不少年轻朋友都在猜测，我多年以前就在预告我将构筑自己个人的哲学体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其实仔细读过本书的人几乎已经可以看出，就其最高原理而言，我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已经在这里面体现了，尤其是《辩证逻辑的本质》《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诸篇，都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一种“体系”的苗头。再加上我于2013年给本科生讲“哲学导论”课后所作的录音整理（最近将以《哲学起步》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更是直接将我想要表达的哲学通过

讲课的方式进行了通俗化的引导。我设想，我所要建立的哲学大概不会像许多哲学体系那样，为了成体系而搞得晦涩不堪，在纯粹概念的王国里天马行空地遨游，而会尽量接“地气”，尤其是接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地气。因此，正如本书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我的哲学几乎注定是建立在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之上的。当然，我的中西比较至今还是文化批判性的，而在正式的哲学体系中，它将更多地是描述性的，批判毕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当我们达到了对中西双方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后，就可以着手来考虑如何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建立起当代的一种更加彻底的哲学思维了。

不知不觉，我明年也即将跨入70岁这一阶梯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就我的自我感觉而言，我觉得我还只有40多岁，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都感到奇怪，我为什么没有年龄的概念？也许是因为，我每天与之打交道的都是些永恒的对象，哪怕我考虑当前的时代，也是着眼于未来几百年。我常常想起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好像基本上没有早死的，除非他自杀（就连自杀都是为了永生）或是被迫害致死，差不多都能够活到80多岁，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几乎是想活多久就活多久。他们都能够活到把自己想干的事情干完。和现代那些郁郁寡欢，甚至惶惶不可终日的哲学家相比，我觉得古代那些哲人更为亲切。我必须像他们那样，好好计算我的生命。

邓晓芒

2017年8月9日于喻家山

目 录

第三版序言·····	1
第一讲 绪 论·····	1
第二讲 哲学史方法论新探·····	27
第三讲 论历史感	
——现代解释学的启示 ·····	64
第四讲 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	103
第五讲 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	138
第六讲 辩证逻辑的本质·····	182
第七讲 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216
第八讲 西方哲学史中的实体主义和非实体主义·····	250
第九讲 胡塞尔现象学导引·····	289
第十讲 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	326
第十一讲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361

第十二讲 让哲学说汉语

——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 397

第十三讲 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 440

第十四讲 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 478

后 记 526

再版后记 528

第一讲 | 绪 论

我们哲学史方法论的课现在就开始了。这个课程是一个传统课程，哲学史方法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武大哲学系刚刚开始研究生招生的时候就有。当时哲学史教研室很小，包括中哲和西哲，西哲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都在一个教研室，江天骥、萧萐父、陈修斋、杨祖陶，这几位老先生共同在这个哲学史教研室里面担纲，那时就开了这门课。我是1979年读的硕士研究生，还有上一届1978级的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读的一门必修课。整个教研室，中哲、西哲的研究生在一起研讨怎么样看待哲学史的问题，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现在这个话题好像不太有人提起来了，但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当时正在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涉及如何看待哲学史。说起来是一个方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如何看待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如何对待和评价人类的精神财富。按照“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以前长期以来通行的、官方的看法，也就是从苏联的日丹诺夫那里接收下来的一整套苏式理论、日丹诺夫的理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观来看，简单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最后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整个哲学史就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当时从苏联也翻译了哲学史的教材，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哲学观点来贯穿的，就是西方哲学史——当然苏联只能写西方哲学史，它不能写俄罗斯哲学史，俄罗斯

没有什么哲学史，他们的哲学史就是西方哲学史，写到现代才有了罗蒙诺索夫这样一些俄国哲学家，但基本上是西方哲学史。那么在苏联人的哲学史里面，就是两条线索，一条是唯物主义线索，一条是唯心主义线索，哲学史描绘这两条线索是如何“两军对战”的，在每一个阶段不断地互相争斗，而这种斗争的背后又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哲学史归根结底被看作阶级斗争史。当时在哲学界和哲学史界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这样一个日丹诺夫的定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所以当时以及更早出版的好几本欧洲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写的。这个模式表现在写作上面，无非就是一开始就谈社会历史条件，然后是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奴隶社会经济呀，封建社会经济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呀，等，然后是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分析出来以后，就把它往那些哲学家的头上去套，这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那个哲学家代表哪个阶级，所有的哲学观点都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提出来的，那么利益不同，当然所反映出来的哲学观点也就不同了。所以哲学观点讲来讲去实际上都是利益的不同，都是耍嘴皮子的事情，最后都是一些利益冲突、利害冲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的问题。这是以往哲学史的传统写法，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是在当时是不可动摇的。凡是讲到哲学史，就必须是这样写，包括我们的先生，像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写的《欧洲哲学史稿》，里面也有这方面的痕迹。当然他们那本可以说这种痕迹是最淡的。陈先生和杨先生他们特别注重学理的分析，书里面有很多思想分析，比如哲学思想究竟怎么样争论，有哪些问题，是怎么样过来的，他们比较重视这个。所以在当时流行的好几本西方哲学史、欧洲哲学史教材里，陈先生、杨先生这本是最具有学术品位的。但还是脱离不了这种影响，要戴上一个帽子、一个紧箍。

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哲学史教研室的几位老先生深感我们受苏联的日丹诺夫定义的束缚太深，根本就放不开。你想在哲学史里面谈点哲

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动不动人家就要批判你，混淆了阶级矛盾，混淆了阶级界限。对唯心主义要加以纯学术的评价，那就是抬高了它的地位，你只能骂它，不能评价它。所以，当时那些哲学史著作我们今天读起来，不能当学术的东西来读，当历史来看勉强可以。就是说那个时候是那样的，碰到唯心主义就骂，碰到不喜欢的就给它扣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做法。

那么后来，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思想解放，有的人就想在里面松动一下了。松动了一下，就找到了一条列宁的语录。列宁这条语录是在《哲学笔记》里面谈到的：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的认识史。人类的认识史，这就和阶级斗争离得比较远了。你不能说哪个阶级有认识，哪个阶级就没有认识。这就有一点混淆阶级矛盾和阶级界限了。这样一说呢，哲学史就比较好讲了。讲人类认识，你当然可以讲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但是你要讲明白，为什么是正确的，认识上出了什么问题，就还有一些理论性了。所以当时一个比较松动的提法，就是把哲学史理解为人类的认识史。这就把日丹诺夫的那个定义一下子冲掉了。日丹诺夫的那个定义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文本根据。他就是想当然的，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了，他就说一切都是阶级斗争，所有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思想上的问题不拿到阶级斗争上面来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

列宁提出来的“认识史”观点，给当时的哲学界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生气，大家纷纷引证列宁这个观点来解释哲学史上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这就有一定余地了。不过列宁的这个认识史的观点虽然有一定松动，但还是有他的局限性。哲学史怎么仅仅就是认识史？认识史还包括自然科学呀，还有数学，这些也是认识史，那么哲学史跟这些认识史有什么区别？再加上哲学史还有别的方面，除了认识以外，它还跟道德呀、法律呀、宗教呀、艺术呀、审美呀这些东西都有关系，怎么能够把它仅仅限制在“认识”这一个方面？所以列宁的这个“认识史”观点也被人们怀疑，当时还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王荫庭先生，经过和俄文本原文的对照，认为这个“认识史”其

实是翻译错了的。列宁讲了认识史，但讲的不是哲学史，哲学史讲的是另外一回事，在排版的时候把它排到底下了，但是按照列宁的手稿，不应该排在那个后面，而应该另外排。所以这个观点在起到一定的作用以后，人们也开始怀疑，就是说，哲学史不能够这样简单地把它定义为或归结为另外的什么史。哲学史就是哲学史，你就要用哲学的眼光去看它，不能用科学的眼光，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眼光，也不能用道德的眼光、政治的眼光把它还原为某种别的东西。

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的，我们在座的不了解情况可能觉得很奇怪，包括我们哲学系，当时一大批老先生，当然他们中有些人学问是做得很好的，但是思想始终受到禁锢，非常敏感，当时有一句话叫作“政治敏感性”嘛。一个人失去了政治敏感性，失去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当时就是一个罪。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就会出来说，你这是抹杀了阶级斗争了，你这是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了。但是我们那几届研究生进来以后，个个都是有“反骨”的，对于以往的那些东西，甚至是深恶痛绝，觉得思想受这种东西的限制，那还谈什么哲学。我们那两届研究生都是从底下直接上来的，大部分都没上过大学，都是自己看点书，然后有自己的体会。所以在讨论会上，大家发言都非常踊跃，都想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一个教室里面二三十人，简直就很难找到一个说话的机会，逮着一个说话的机会就不断地说，而且一争起来就面红耳赤，就拍桌子，甚至于互相骂起来。当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老师呢，基本上就是在旁边听，在结束的时候就出来作一番总结，作一番调和。因为老师的观点也在不断地开放，也在松绑。当时就觉得我们这几届研究生的思想特别活跃，有的简直超出了老师的意料。当时的气氛就是开放嘛，就是要解放思想嘛，所以也没有什么打棍子的现象。当时的好几门课，“两史”——西哲史和中哲史的课程有好多，中国哲学史还有原著、经典，西方哲学史也有亚里士多德啊、康德啊、黑格尔这些课程。但是，最使人感到激动的、感到兴奋的，就是哲学史方法论课。

因为只在哲学史方法论课上，大家不受自己的专业限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方法论嘛，不单是中哲的方法论，也是西哲的方法论；也不单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那时也有“马哲”的来听课的）。方法论是可以适用于一般的哲学的，而且还不单适用于一般的哲学。适用于一般的哲学了，那就什么都适用了，什么领域，它都可以适用。所以，这是武大的一个优良传统，方法论课在别的学校没有，只有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有——后来分成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和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但是这个课还是合在一起开，还是两室合开的一门课。这传统一直保持了好多年，一直到前几年才分成两门课，就是西哲史有一个方法论课，中哲史也有一个方法论课。这是前几年才开始的，因为随着学科的分化，专业越来越具体了。而在此之前都是在一起，经常是，中哲主持这个课，也请西哲的老师讲；西哲主持这个课，也请中哲的老师去讲，这就打破了学科的限制和界限。

这个传统当时在国内似乎只有武汉大学有，也就带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特点。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生经过这样的思想训练，毕业出去，人家就发现，武大毕业出去的研究生比较具有理论层次，比较有思想。特别是中哲、西哲的一出去，人家就发现你不光是搞文本的，你不仅仅是读了那几本书，你经过方法论的训练，你有自己的考虑，你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材料。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今天讲名气嘛，也许北大、复旦可能排在我们的前面，但是实际上我们这里毕业出去的学生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在思辨能力方面，在哲学的把握能力、领悟能力这些方面比较突出。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弱点，我们对外交流等方面，可能赶不上他们。但是，作为哲学系的学生，首先最重要的是哲学方面的素养，这是我们的长处，所以，哲学史方法论课，对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来说，是一个品牌课程。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出过一本《哲学史方法论文集》，武大出版社出的，当时收集了一些老师在上方法论课的时候的文章，还有一些研究生的文章，大家想要了解的话，还可以到资料室去翻一翻。后来

还打算出第二本论文集，曾经由我来主编过，搞了一个打印稿，但没有出版。方法论课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我首先想要跟大家交代的一段历史。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谈很多，不能够进入正题，下面要谈的就算是一个绪论。在绪论里面，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哲学史需不需要一个方法论；第二个是，什么是哲学史的方法论；第三个就是如何学习哲学史方法论。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哲学史需不需要一个方法论。我记得1996年我们在昆明曾经开过一个会，是由北大哲学系主持的。当时举办这个会议就是为了讨论新编一套《西方哲学资料选编》。北大以前编过一套《西方哲学资料选编》，这一套包括好几本，比如《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的，影响很大，不断地再版。还有一本《中世纪哲学》在计划中，但还没有出来，可能有一些译稿，至今还压在老先生们的抽屉里面，也许有的老先生已经过世了，就没有搞了。再一个就是《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基本上把近代的西方哲学理了一下，两条线，一个是唯理论，一个是经验论，影响是很大的，选的也很好，都是经典著作里面的段落。还有一本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爱尔维修啊，狄德罗啊，伏尔泰啊，卢梭啊，这些大家的代表作，都有一些片段选在里面。还有一本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就是讲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这些代表人物的著作段落选在里面。这是北大在20世纪60年代选编的一套书，这在各个大学的老的哲学系资料室里面都有，武大哲学系也有，有好几套。这套书影响非常大，非常深远。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北大的哲学系觉得这套东西已经不够了，因为人们的知识面已经远远不是20世纪60年代那样了。再一个，对于经典文本的理解，这套书也显出当初选编时的一些局限性。有些局限希望加以弥补，有些没有收入进去的东西，希望能够更多地收入进去，而有些东西呢，希望能够减少一些。比如说，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国内对康德的东西比较重视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

哈的东西就有一些忽略，再比如《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哲学》，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些人的哲学文章。当时人们就觉得这些东西其实算不上哲学的经典，所以希望能够重新编一次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资料。所以1996年我们就在昆明开了会，在会上大家就讨论如何编这些资料。

当时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照外国人的编法，看外国人是怎么编的，外国人重视什么东西，我们就重视什么东西。这当然很简便了，也能够紧跟西方现代最时髦、最新的潮流。这一派的观点认为，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我们中国人只能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走，因为西文不是我们的强项，这个我们绝对赶不上，你搞一辈子，你搞几辈子，你也赶不上人家。人家的希腊文、拉丁文这些东西从小就有基本训练，我们没有这个训练，我们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面不可能超越西方。所以他们主张，我们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的观点，不要有自己的什么看法，或者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是用自己所体会到的某种方法对它加以整理或处理，这都是用不着的，这都是白费力气。过几十年回过头来看，你做的那些工作都是无用功，真正能贴近原文的还是西方哲学家，他们搞自己的东西嘛，应该比我们搞得要更精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派观点。这个观点还表现在对资料的处理方面，就是对资料尽量地不要遗漏，要重视资料的整理，凡是能够在西方造成影响、有定评的，我们就要收进来，不要受任何观点的左右。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的资料选编也好，翻译也好，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甚至有意地歪曲，有意地删节，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删掉。至于翻译嘛，好办得很，当时又没有版权问题，我们搞我们的，这句话我们不喜欢，我们就把它删掉。现代西方哲学涉及很多东西，凡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它删掉，就当没有这回事。这是很简单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后来呢就觉得这个太过分了，还是要客观嘛。所以这些人认为，我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资料工作，就是尽量完整地反映出西方哲学的概貌就够了。

那么另外一派在会上提出的观点认为，编资料集还是要有哲学的层

次，哲学史不光是历史，它还是哲学。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哲学家，不要说你搞一个资料选编根本不可能把他们全部都收进来，哪怕你搞一个大全，都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收进来。浩如烟海的资料嘛，你怎么可能把它们全部收进来？所以必须要有选择，而要有选择，就要有观点，就要有自己的取舍。历史上有些东西风靡一时，过了几年，过了几十年，没人提了。为什么没人提了？它到底有没有价值？现在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比较重视某些人，把他提出来，搞得很热闹，是不是真的就那么重要？你就盲目地相信他们，跟着他们转，过几十年他们又不提了，那你也不提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哲学史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当时包括我在内，有几个人提出来，哲学史的意义还是在于提高国人的哲学素养。要提高素养，你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大堆资料的编纂、汇集，而必须要有取舍。你要分得清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东西对西方的哲学精神具有代表性，这就需要有哲学观点了。你自己没有任何哲学观点，你如何能够取舍？你如何能够看出，哪些东西具有代表性，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东西是枝节的？比如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当时我们吹得不得了，跟着苏联吹，后来苏联也不吹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当时在会上的争论非常激烈，不仅仅包括选编怎么选，而且包括哲学史怎么写，都有很激烈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写哲学史就是把资料客观地、原原本本地摆出来，而且在那个时候实际上也出了几本这样写成的哲学史，像人大出的基本上就是摆资料的哲学史，复旦出的全增嘏的那个本子不完全是摆资料，也有些观点，但那些观点是陈旧的。这些书要么就用旧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来处理这些资料，要么就完全不设观点来处理这些资料。

当时我们提出来，既不要用意识形态来处理资料，也不可能完全不用观点，而是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有自己的哲学观点。你写哲学史嘛，没有点哲学的观点，你不是一个哲学家，怎么能写哲学史呢？当然国外有，像梯利这些人写的哲学史，就是大学教授的哲学史。所谓大学教授的哲学史，跟哲学家的哲学史是不一样的，他就是摆资料，而且他了解在历史